

贺子珍

曹西河 著



K827
CXH/1

● 曹西河 著
● 中国青年出版社

贺子珍



040740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贺子珍/曹西河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8
ISBN 7-5006-2479-4

I. 贺… II. 曹… III. 贺子珍-生平事迹 IV.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9540 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1/32 20.5 印张 3 插页 451 千字

1997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1997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定价 25.00 元



本书作者 曹西河

序

王定国

像许许多多红军老战士一样，贺子珍是值得后人怀念的。她的一生，特别是她从井冈山到延安的经历，就是一部内容丰富、多风多雨的书，其中，有多少人生的至乐、至苦、至恨、至爱，后人必将从中得到一些启示。因此，我欣然从命，为《贺子珍》一书作序。

我是1937年底在兰州认识她的。当时，她从延安出走，到西安住了一个多月，来到兰州，准备赴苏。同行的还有赴苏治病疗伤的刘英、蔡树藩、钟赤兵诸人，住在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当时谢老（觉哉）任中共中央驻兰州代表，热情地接待了这位在江西瑞金一起共事的老战友和其他几位红军老战士，我们还在办事处拍了有纪念意义的照片。

贺子珍穿一件灰色军大衣，长长的头发，脸孔白皙清秀，气度端庄，内心的刚强和外貌的温柔娴静融合为一，一看就让人觉得是个见过世面的有教养的女同志。她在兰州等待飞行消息，等了将近一个月，所以，我们经常一起闲谈，一起议论抗日的时局，一起脱去军装，穿起百姓们穿的衣衫，到街上观看市容，到黄河边观看流水。我是西路军的，我们还谈起西路军悲壮的失败。她是个极富同情心的人，听到西路军战友们的不幸遭遇，激动得满含热泪。这使我感到她的亲切和亲近。

谢老曾对我讲过：子珍是一个刚强的人。我对照眼前这个风度超群而又亲近温存的女人，似乎同刚强二字联不到一起。但谢

老说，她外柔内刚，的确是一个刚强的人。

贺子珍生于江西永新一个书香之家。当时，中国如同一个无保障的家庭，谁都可以来拿东西，世界列强纷纷划分势力范围。出于忧国忧民之心，她自幼立志寻求真理，16岁便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斗争，并在北伐战争之后，参加武装斗争，带兵打仗，被国民党反动派围攻而撤退到井冈山寻求出路，不惜与“梁山好汉”为伍，这在当时，应当说是过人之举。就在这个时候，她认识了领导秋收起义残部向井冈山撤退的毛泽东，从此，相随相伴走过10年烽火连天的艰难岁月。

在被敌军重重围困的日子里，红军三天一小仗，五天一大仗，一次又一次面临几十万人的大“围剿”。贺子珍全身心投入，参加了前三次的反“围剿”，战火纷飞，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在反第三次“围剿”中间，敌机轰炸，把她震昏过去，掀起的泥土把她埋得严严实实，等她醒过来，扒开泥土，不禁放声而笑：“我还活着！”这就是她的本色。如同古人所说：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

当时，毛泽东的从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并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以王明为代表的中央横加罪名，多方责难，毛泽东三起三落，重病缠身，差点死去。贺子珍和他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精心照料，帮助毛泽东尽快恢复健康，重新走上指挥红军的岗位。她从来不为一时的荣辱所动，表现了一个革命女性的坚强的意志、宽阔的胸襟和深厚的真情。记得邓小平讲过这样的话，大意是如果没有毛泽东，我们还在黑暗中摸索。而贺子珍，就是毛泽东艰难地进行农村包围城市伟大实践的见证人和参与者。

从谢老的介绍、从我同她的交谈以及从一些老红军的叙说中，我发现贺子珍是一个对人无所求的人，所以她活得很自在、很自信，乐于助人，笑口常开。枪林弹雨，生死咫尺，都没有摧毁

她，反而激励了她，但长征路上被敌机轰炸受重伤（有些弹片留在身上直到50年后在上海去世时都没能取出来），加上生儿育女之累，反倒摧毁了她的青春，也摧毁了她的健康，使她不能精力充沛地投入工作和学习。她为此而深感痛苦，并时刻想摆脱它，她离开延安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谢老在瑞金时是中央政府的秘书长，贺子珍是毛泽东的机要秘书，他们天天见面，无话不谈。有时，她同毛泽东吵了架，也把始末告诉谢老，请他出来平息。谢老讲过：主席的脾气不好，子珍的脾气也不好，有时吵得不可开交，其实，都不是为自己，多半还是为对方好。有一次，大吵一通，起因于贺子珍看到毛泽东的衣服补了又补太破旧了，到供给处去领。供给处长说没有主席写的条子，不能领。主席知道，大为光火：物资困难，衣服补一补还可穿，为什么要领新的，还背着自己。他们两个人一个是铁，一个是钢，一碰就叮咣乱响。后来，到了延安，贺子珍打了一个女翻译一个耳光，于是，两个人又大吵起来，一个拍桌子，一个摔板凳，毛泽东让贺子珍上党校学习，贺子珍偏不去。谢老又出来调解。谢老后来同我讲，他生平只向毛泽东提出过两次请求：一次是长征之前，他得悉他的老朋友何老（叔衡）留在江西，不能随大队出发，深为不安。何老因为不同意王明等人的做法，被罢免工农检查部长等所有职务，受到冷遇。谢老于是去找毛泽东，请求让何老随队出发。当时，毛泽东也挨整，在中央没有发言权。他虽然向上建议，让瞿秋白、何叔衡一起随大队走，但没有得到同意。谢老的担忧并不是没有理由的，红军出发不久，他们二人都在福建牺牲了。一次是延安，他去请求毛泽东，不要让贺子珍上党校了，一次、两次，毛泽东没有点头，第三次才点了头。他觉得一对脾气不好、各方面都很好的夫妻，同甘共苦这么多年，风风雨雨走过

来不容易，不能因此伤了感情。他希望两个人和好如初。不久，他被任命为中央驻兰州代表，到兰州上任。没料到，贺子珍还是离开了延安。可以说，性格的差异和矛盾，是贺子珍离开延安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有文章说到贺子珍离开延安，同江青插足有关，这是不确实的。贺子珍走了，江青才来，她们根本没见过面。但是，贺子珍一走，确实给江青留下一个空子，许多老红军都觉得这确实是千古遗憾。

贺子珍离开延安前，毛泽东一再挽留。贺子珍到了西安，毛泽东拍了电报，请中央驻西安的代表林老（伯渠）劝贺子珍回延安去。贺子珍当时想到上海开刀，取出身上多处的弹片，并做人工流产，做绝育手术，生孩子生怕了。正好毛泽民、钱希均夫妇化装成客商从上海运物资回到西安，住八路军办事处。他们告诉贺子珍，上海打仗了，不能去了，并且一再劝贺子珍回延安去，但没有结果。贺子珍想和刘英他们一起到苏联治病学习。

钱希均第二年同毛泽民一起到新疆，路过兰州，曾经同我谈起这一次她劝贺子珍的情形。她们是妯娌，从瑞金就在一起，亲密无间。钱希均和贺子珍挤在一张床上，谈到深夜，劝她“回到大哥身边去”。她看贺子珍这么坚决，便用母女之情打动她：“你走了，娇娇这么小，谁管呵！”贺子珍说：“他管嘛！”钱希均问：“大哥谁管呵？”贺子珍没有说话。钱希均吓唬她：“听说，一些去延安的女青年专门找长征干部，你不怕你走了，有人去找他？”贺子珍笑一笑，不以为然：“他爱我，我走到天边他也爱我；他不爱我，我天天在他身边，他也不爱。”最后，她们还是没有谈拢。贺子珍托钱希均给毛泽东带一条被子，说他盖得太薄了，钱希均说：“你这么惦着他，这又何苦来！”贺子珍说：“生孩子生怕了，我要去治病，

取弹片，做绝育手术，好好学习。我一定要走，制制他！”建国以后，我多次见到钱希均，每次谈起这段往事，她总是感叹不已。她说贺子珍“人很聪明，可性情太犟，谁会料到后来的变化。她还是太年轻了，想不了这么多，顾不了这么多！”又说：“我们当时都太年轻了！”

一天，谢老拿着电报告诉我：“主席来电了，让我劝劝子珍，别走了，回延安去。”我说：“你的话，她兴许能听进去，你们是瑞金时代在一起的熟人了。”谢老想了想，说：“我知道子珍的犟脾气，试试看吧！”谢老同贺子珍谈了好久，但没有成功。谢老叹了口气说：“子珍这个人哪，就是这样的，只要她下了决心，你是劝不转的！”

1937年12月25日，谢老的日记写道：“晨，徐、蔡、贺、钟、刘五人飞迪（乌鲁木齐），他们等了将近一月，如鸟出樊笼，欢喜无限。机场的苏联人员早在工作。”我们送他们上路，祝他们一路平安。谢老还一再叮嘱贺子珍要好好治病养伤，早点回来。我也同她握手告别，希望早日再见到她。谁料得到一别就是20多年，差点成了永诀。

我们再见面是在1959年3月的南昌，当时，谢老在江西视察，得知贺子珍在此养病，便去看望了她。她看见谢老，紧紧握着谢老的手，眼泪夺眶而出，好久才说：“谢老，我没有听你的话，我没有回延安去！”谢老也为之动容，握着她的手说：“子珍哪！如果知道今天这个结局，我怎么也不会放你走呵！”这年，贺子珍才四十多不到五十岁，还是那么气度高雅，眉宇清秀，但是已经有了白发，也显得有些憔悴。那天，听到她别后的经历，特别是在苏联不幸的遭遇，我们听得心里发疼，禁不住流下同情的热泪。

60年代初，三年困难时期，《北京晚报》副刊要为谢老开一

个专栏，名叫《学语集锦》，摘录谢老几十年来的文章、演讲中的警句，作为奉献给读者的一份精神食粮，这事由晚报记者丁浪经办。谢老欣然答应，还把他几十年的日记交给丁浪。谢老有记日记的习惯，几十年来记下好几十册，在战争期间遗失了一部分，还留下大部分，计100余万字，其中有写贺子珍的。丁浪和本书作者一起细心读了谢老的全部日记，作了摘录，他们夫妇当时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竟然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一个叫贺子珍的人，而且曾是毛泽东的夫人。这引起他们极大的好奇，想了解贺子珍其人。由于好奇，30多年来，一直留心收集贺子珍的资料；特别留意从老红军处收集活的资料，我曾带他们去采访过一些老红军和贺子珍的女儿李敏。久而久之，他们发现应当好好写一写贺子珍。《贺子珍》这本书，就是作者30多年来思考、收集、研究、探索的产物。

贺子珍的青春，她的心血、她的感情以至她的整个生命是属于红军的，属于中国的普通人的。我欢迎贺子珍重新来到人间。她的出现，一定会使老红军们见了感到故人重逢，倍觉亲切；她的出现，还可让更多的读者特别是年轻人，认识这样一个性格鲜明、心高志远、与普通人息息相通的富有传奇色彩的女红军。她和千千万万的红军和千千万万的志士仁人一道组成了中华民族的脊梁。有了脊梁，才能挺起腰来，一个人如此，一个国家也是如此。所以，我欢迎《贺子珍》的问世。

1995年冬

目 录

序	王定国 1
第 一 章	1
第 二 章	23
第 三 章	58
第 四 章	82
第 五 章	112
第 六 章	141
第 七 章	165
第 八 章	188
第 九 章	212
第 十 章	240
第十一章	269
第十二章	295
第十三章	326
第十四章	359
第十五章	383
第十六章	408
第十七章	435
第十八章	458

第十九章·····	483
第二十章·····	507
第二十一章·····	536
第二十二章·····	557
第二十三章·····	581
第二十四章·····	605
丁 浪 访侯政谈贺子珍·····	631
后 记·····	640

第 一 章

有时候，国家兴亡、事业成败这一类的大事，往往是从一个不被人注意的时间和一个人不被人留心的地点开始的。眼前，1927年10月6日，在井冈山下大仓村毛泽东同袁文才的会见，就有这样的意义，一条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的井冈山之路，就在此时此地开了个头。

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失败的部队向南转移，想在山高林深、民风坚韧的井冈山好好喘口气。这是“梁山好汉”袁文才的地盘，听说他还入了党，不知有没有这个胸怀，让起义军在这里落脚；同“土匪”为伍，很可能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风险，但眼前只有这条路可以走。而袁文才平日受尽豪绅和民团的追剿，早想得到有力的外援，但又怕世上常常出现的大吃小、强凌弱，心有疑虑。所以，他同毛泽东在大仓村的会见，怀有很大的希望，又战战兢兢，他同时感到风险的巨大和可怕。

临了，两个人都同意会见，因为事业发展与风险同在。

大仓村林家吊楼的楼上客厅里，袁文才正同毛泽东会谈。表面和气，暗里却很紧张。

毛泽东身材魁梧，大概瘦小的袁文才在他面前很容易产生来者以大吃小的想法。他身穿灰色中式汗褂、灰色宽腿裤，颈上围着罗布毛巾，脚穿草鞋，头发很长，眼睛也大，天宽地圆，神态安详。他友善地听袁文才讲话。

忽然村外传来一通鼓响，随即楼下有人惊呼了一声。

这一通鼓响，等于宣告毛泽东一行已经处在刀口上，危在旦夕，随时有送命的可能。

袁文才听见鼓响，登时站起来，向毛泽东拱一拱手：“山上有老虎，待我去看看就来，诸位请稍候。”

毛泽东几个人面面相觑，不明究竟。警卫员何有富、水生连忙站在窗口仔细观察。

袁文才下楼，悄悄地问师爷陈慕平：“有多少人？”听回答说一个连，连忙下令：“再探！”说完四处检查，只见楼下埋伏的枪手已对准楼梯口；对面大树丛中，枪手已瞄准了毛泽东。这才放心地坐在楼下正厅八仙桌旁，点着一支香烟，打着烟圈，望着天花板想事。

他的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他亲眼见过大吃小，不能不防；他还担心起义军的人不一定看得起他，好听是“梁山好汉”，不好听是“土匪”。所以，听说来了一支上千人的队伍，有穿军装的，穿农民衣服的；打的旗子也不同，有红旗、有镰刀犁把旗，还有青天白日旗，形形色色，他心中就忐忑不安。后来派师爷，一个念过中学、在武汉农民讲习所学习过的陈慕平去联络，知道是秋收起义的队伍，带头的是他的老师毛泽东，才稍稍地定下心来。毛泽东捎话让袁文才决定会面地点。他决定在眼前这个村子，从起义军驻地古城到这里，和从他的家茅坪到这里各走一半路，既以礼相待，又便于进退。他的助手李铭还担忧地提醒他：“他们千把人，万一有埋伏怎么办？”袁文才决定带一头肉猪，事先在大仓林家吊楼四周作好埋伏，看他举手行事：来者善意，举右手杀猪款待；来者不善，举左手杀人。今天大清早，手下便在林家吊楼埋伏了 20 多人、20 多条枪，附近的林子和山头还有伏兵和游动

哨，挎刀持枪，戒备森严。吊楼后头关了一头肉猪，杀猪刀磨得锋快。袁文才还特别吩咐在山口负责放哨的李铭：“如果毛委员后面没有队伍，敲锣，我们好出门迎客。如果后面来了队伍，进入山口，响第一通鼓，我停止谈话，准备动武；进入村前的山坳口，响第二通鼓，我听了举第一次手；进入吊楼前边的林子，响第三通鼓，我举第二次手，杀人！”

如今第一通鼓响过了，他的心同鼓点一样咚咚直跳。

楼上，毛泽东也点着一支烟，深吸了一口，走到窗前看看，没有什么动静，又回到厅里，发现挂着的古画晃了晃。水生上前轻轻掀开一看，有个枪眼，一支枪正对准毛泽东的座位。这时外边一声狗吠，把同行的战士吓了一跳，水生连忙上前挡住，把毛泽东同古画隔开。

毛泽东意识到形势严峻，是不是有人怕谈判不好，把队伍带到大仓来了。他担心的是团长陈浩。

起义军到了古城，军官们开会，有过激烈的争吵，队伍进入袁文才的地面，袁文才采取什么态度，是个有关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毛泽东以为：这里的大山够大的，风光蛮好，你想藏起来，来个万把军队，也不一定找得到，进可攻，退可守。万一探不到贺龙、叶挺的消息，这里也不失为一个落脚点，就怕袁文才、王佐拒之门外。陈浩以为：多给点买路钱，在这里歇歇脚，倒也不坏，不过，土匪难防，还是来硬的好。营长张子清不同意，他认为袁文才出身贫苦，母亲被豪绅逼死才上的山，后来入了党，参加暴动，不能还把他看作土匪。再说强龙难压地头蛇，你砸他一石头，弄不好砸到自己脚上，还是来文的好。赞成他意见的过半。陈浩越争越上火，认为：一朝为匪，终身难改，干脆把他们杀了，一劳永逸，歇歇脚，再好好打我们的江山，怎么能同土匪为伍。也有人赞成

他的主张。毛泽东一再强调，他们都是逼上梁山的农民弟兄，应当把他们看作亲人。陈浩不觉好笑：亲人？叶挺独立团，北伐铁军，同土匪做亲戚？说着，拍了桌子。毛泽东也拍了桌子：是的，中国四万万农民都是我们的亲人，要你当哥，你就当哥；要你当弟，你就当弟，当儿子、当女婿也无妨。这不但失面子，还添了光彩。临出发的时候，张子清怕谈不拢，要带队护送，毛泽东拒绝了，他说带兵来反而不安全，只是让他把送给袁文才的枪赶快派人送来。

毛泽东弄不明白，外头发生了什么事。他要告诉袁文才送枪的事，刚才谈到在这里落脚，还没来得及谈这个。他想：是不是说晚了。

袁文才在楼下，坐立不安：果然派队伍跟来了，这太不仗义了。狗吠声也把他吓了一跳，从椅子上蹦了起来。同时，村口山上传来第二通鼓响。袁文才急忙向门口走去。

这时，楼上传来毛泽东的喊话：“文才同志，文才同志！”

袁文才在门口第一次举起了左手，一动不动。

一看袁文才举起左手，楼下四角个个举枪瞄准，盯住楼梯口。楼上屋顶四角，隐约冒出几个端枪的人。一旦有事，毛泽东一行不单下不了楼，也掀不了瓦上不了屋，楼前几棵大樟树藏着的几个枪手，正好瞄准楼上正厅吸烟的毛泽东和他的随行人员。

楼上又传来毛泽东的问话：“文才同志，是不是山上的老虎进了村了？”

显然，毛泽东看见了楼顶一角埋伏的人伸出的枪口，忙朝楼下喊道：“文才同志，老虎在哪里？”边说边下楼。

警卫把他拦住，使了眼色，往楼下努了努嘴。

楼下，袁文才听见声音，不敢答应，又听得第三通鼓响，他再

次举起左手，如果重重放下，就是命令开枪杀人了。

墙上大挂钟敲了十下，把楼上楼下的人都震得坐立不安。

这时，楼外林子那边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

楼上楼下的人几乎同时往外看，只见两个女子策马驰骋，向吊楼这边飞驰而来。

楼上，随行人员看着毛泽东，莫名其妙。

毛泽东也觉得奇怪：“不是老虎，是女娃子，原来袁文才是个魔术师。”

很快，那个女子跳下马，连连向袁文才摆手。楼下传来她清亮的声音，她称呼他的号：“选三大哥，不可！”

袁文才忙把举着的左手，向楼内外缓缓地左右摆了几下，放了下来，这是表示暂停。

那个女子和袁文才低声说着什么，有点神秘。

毛泽东点起一支烟，吸了一口，吐出打圈的轻烟。他本来好奇，很想下楼去看个究竟。

楼梯响了，姑娘的声音从下边飘上来：“毛委员，毛委员，哪个是毛委员？”

毛泽东迎上去，微笑着往下看：“鄙人就是毛委员。”当他看到来的是一个清秀的姑娘时，不觉有些惊奇：“请问姑娘，尊姓大名？”

姑娘仰着头看高大的毛泽东，随意地回答：“贺子珍！”又目不转睛地去看毛泽东的头，看前边、看右边、看后边、看左边，转了一圈，笑了，笑得很恬静。

毛泽东惊异地转过头，审视肩上，以为自己的头上、肩上有什麼不堪入目的东西。

贺子珍笑盈盈地：“你的脑子怎么会有这么多主意，写出这